美欧设阻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战略短视

章玉贵

欧洲议会决议 意在影响域内大国

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的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一项决议: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在博得眼球关注的同时,也向世人再次证明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在国家利益面前,自由贸易从来就是假命题,没有例外。

尽管欧洲议会位列欧盟三大机构之一,但其在欧洲政治版图中并没有多少实际地位。不过,自诩为欧洲利益保护者的欧洲议会议员们,却通过此次决议的运作,将自己置于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存在感陡然增加。一些西方媒体也借此炒作欧洲议会的决议,认定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雄心遭遇空前打击,中国将很难在年底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从公开报道释放的信息来看,欧洲议会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大概有三个层面的考虑:一是中国并未达到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二是欧洲产业竞争力相对较落后的国家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三是美国在幕后使绊子。

从第一个理由来看,中国确实在某些方面未能满足上述五项标准,但中国肯定比已经获得欧盟承认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在市场经济进程方面要彻底得多。显然,这条理由并不厚实。何况欧盟一贯标榜的五项标准,欧盟及其域内国家经常违反。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期间,欧盟及其成员国往往将不干预经济的原则抛在一边,为了提振欧洲经济,甚至不择手段。

至于第二条理由,则明显折射出最近几年来在全球经济与贸易竞争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表现乏善可陈的欧盟部分成员国,意图通过拖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来保护本国相对落后的产业,但从长期竞争趋势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自我束缚手脚。

至于第三条理由,则是美国一贯的战略。美国早就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称如果过早满足中国长期寻求的这一贸易优惠待遇,将显著加大美国或欧盟针对在其市场不公平倾销廉价商品的中国企业开征高额关税的难度。各层次的美国官员甚至"苦口婆心"地告诫欧盟同行: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无异于"单方面解除"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防御。

笔者认为,欧洲议会通过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当然是一种先行卡位式的信号释放,更深层次的意义恐怕还在于意图影响赞成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德国、英国等欧盟主导性国家。尤其是工业与贸易竞争力一向保持高水准的德国,并不害怕来自中国的竞争。一旦中德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形成了更高层次更紧密的战略合作,来自中国的投资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德国在国家经济行动能力方面的不足。德国也将通过亚投行以及其他合作平台,顺势提升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实质地位。而金融直觉高度敏感的英国,最近几年来已经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获益良多,将来更希望最大限度获得人民币国际化释放的红利。而英国正从支持亚投行的战略决策中获得回报,且英国的国家竞争力亦保持着高水准。这与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不思进取形成鲜明对比。

美欲拿市场经济地位 锁定中国

美国并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早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首先,美国在历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要么尽力回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要么含糊其辞。中美在这方面的博弈,取得的最积极进展也只是美国表态将以适当方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其次,包括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在内,全球迄今已有81个国家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看来,并非铁板一块的欧盟是最值得警惕的,也是经典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板块。一旦中国成功拿下欧盟,则美国和日本将陷于孤立。因此,美国必须在中国的国际动员力尚未强大到超越美国之前,通过拉拢和分化欧盟,尽可能拖延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间表。退一步说,哪怕欧盟最终赶在美国之前承认中国这一地位,也得逼迫中国在战略利益上做出较大让步,榨取最大限度的红利。

可见,所谓世界贸易规则、自由贸易,等等,在代表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眼里,都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战略锁定的力量工具。美国深知,在美中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面前,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在美中经济利益的战略互动乃至博弈中,只能日益倚重其业已动摇的机制化霸权力压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以继续掌控中美经济博弈的主导权。美国还通过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既要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打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空间,更要借机强化美元在东亚贸易圈的主导地位,进而遏制人民币积极寻求扩大行为空间的努力。因此,从国家战略竞争的视角分析,美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将会继续切割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核心利益,进而打压中国以贸易为纽带提升人民币行为空间的战略安排。

中国定成 全球最大市场经济国家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优制度安排。中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既是中国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自然逻辑延伸,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应然之举。笔者也赞同要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转,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五个基本要素:信息对称、诚信、完全竞争、对产权有效而适当的保护,以及使第三方的负效用最小化。甚至欧盟有关市场经济的五项标准,也与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深化经济改革的文件精神有一定契合。中国从决策层到普通市场主体,都深切认识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认同,更应是行为自觉。如果没有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的市场化融入,中国就不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就不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国。中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全球主要的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是中国经济升级的一般逻辑。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经济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升级的阶段性成果表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楼市急需抑制非理性波动

项峥

如果将时间跨度适当延长,从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推出到现在,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房地产市场始终无法摆脱市场非理性波动的运行态势,主要表现在市场对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存在过度反应。即住宅成交量因为政策鼓励而急剧上升,因为政策收紧而急剧降温,呈现出非理性巨幅波动的运行轨迹,这不仅影响到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而且也容易导致各种风险因素聚集,增加宏观经济金融波动的可能性。

政策变量与 市场波动不一致

我国房地产市场除受到市场运行本身的供求变量影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策变量的作用。理论上分析,政策变量既是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的内生因素,又具备促使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的外生属性。无论是鼓励住宅理性消费,还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市场投机炒作,客观上都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纠偏,矫正市场非理性运行轨迹。但由于房地产被社会过度赋予投资属性之后,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力量就有可能与政策进行博弈,每一次房地产调控政策鼓励住宅消费后的房价快速上涨和成交量急剧上升,以及每一次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后房地产市场成交急剧萎缩,都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对政策变量存在过度反应,导致住宅交易量产生巨幅波动,也容易积聚宏观经济金融风险。

当前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接近"烧烤"的温度,恐怕也是房地产市场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过度反应。目前看,楼市热度没有因为一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升级而降温,反而正加快向二线城市转移,以合肥、南京、苏州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正成为社会投资资金觊觎的焦点。有报道称,当前二线城市楼市"外地人看房占半,两小时卖光"。2016年4月份,"北上广深"全部跌出涨幅前10名,涨幅排名前十的城市被一线周边以及热门二线城市所取代,其分别为惠州、昆山、中山、厦门、苏州、廊坊、南京、珠海、东莞和武汉。二线城市接近烧烤的市场热度,也引发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高价竞地,地价高于楼面价的纪录也不断被刷新。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卖地收入排名前三名的并非北京或上海,而是南京市、苏州和郑州等三个二线城市,其中南京以481亿元问鼎全国,而去年同期仅为107亿元,涨幅高达351%,苏州市卖地收入涨幅高达781%。在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中,合肥和佛山纷纷上榜。

二线城市接力一线城市住房市场温度,一方面是因为二线城市城镇化潜力较大,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就业环境,对外来人口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预期要明显弱于一线城市,加上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传导效应,使得二线城市这样一个区域性房地产市场更适合大资金炒作并退出。事实上,当前二线城市住宅库存消化周期缩短,并非今年年初产生巨大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市场对政策变量的过度反应,导致住宅库存消化大大超过市场供应,进而产生短期显性的供不应求关系。但如果剔除市场投资投机客因素,那么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蜂拥进入二线城市后,有可能会引发未来供求错位的风险。

楼市巨幅波动 易积聚经济金融风险

目前看,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以至于到达房地产业稳定则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地步,反之则可能引发宏观经济金融波动。因而楼市巨幅波动容易引发经济金融风险因素积聚。

当前需要高度关注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业的风险。据央行统计数据,2016年一季度,我国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2%,增速比上年末高出1.3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增速高出7.5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5亿元,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32.5%,较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而这只是表内银行贷款投向房地产业的情况,如果将各种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权益投资进入房地产业的资金进行汇总,再加上以房地产抵押支持的其他行业贷款,那么社会资金流向房地产业的规模就比较高。

房价上涨始终要受到收入水平的"地心引力"制约。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以及一线城市房价高位明显上涨,终究要受到购买能力的制约。去年一线城市住宅成交活跃,绝大部分需求来自住宅置换需求,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上购买能力最弱的首套房需求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一线城市住宅交易价格高位上涨。这显然不可持续。虽然年初以来的中介乱象,如中介机构"首付贷"、"过桥贷"等违规行为推波助澜,年初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热点城市住房交易价格大幅上升,一度引发社会恐慌性购房需求入市,进一步加剧了房价对收入和租金的偏离,但考虑到热点城市住宅进一步泛豪宅化,以及相当部分上市公司全年净利润不足以购买一线城市一套普通住宅的情况下,刚性需求购买力将成为房价上涨的"地心引力"。

房价过快上涨也将透支城镇化。房价上涨过快与城镇化进程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就业机会、收入预期、生活成本综合权衡的结果。房价作为家庭运转主要成本支出,受到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双重制约。目前,我国二线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就业吸引力方面仅次于一线城市,对外来人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二线城市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难以形成类似一线城市对社会资源的持续集聚效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更无法与一线城市相提并论。如果住房价格保持稳定,那么二线城市可通过可持续发展并带动外来人口稳定流入,实现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市场非理性对二线城市城镇化预期的过度透支,最终将导致未来二线城市城镇化进程放缓。

因此,无论是为了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满足居民合理居住需求,还是实现宏观经济金融稳定运行,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都需要抑制市场非理性行为,努力减少市场对政策变量的过度反应,尽快摆脱楼市因为政策变化引发交易量巨幅波动的历史循环。

全球经济拐点或已悄然来临

王宸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先后调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之际,中美两国经济数据却分别出现了难得的亮点,毫无疑问,中美经济撑起了全球经济半边天,如果仔细分析中美两国经济数据,很可能意味着世界经济的拐点已经悄然来临。2016年或许世界经济会有难得的表现,美欧金融危机以来的中长期经济衰退很可能真正出现了逆转。

中美数据历来相互印证。在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环比增长了,这个压制中国经济长达30多个月的经济数据,似乎已经完成筑底,中长期价格回升已经展开,不管是L型还是W型,中国宏观经济整体稳步回暖已经开始。4月份中国贸易数据还显示,中国对美出口保持同比增长。而美国经济数据也显示,4月份销售环比大幅增长,PPI环比为0,也好于负增长,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贡献了较大的力量。要知道中国还会拉动背后全球大宗商品的增长,那么,中美两国的经济数据几乎就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的风向标了。

在中国贸易数据中,对欧、对日都是负增长,这揭示出欧日经济的弱势复苏势头,以及宏观局面软弱的欧日局势,但是,在日本央行维持政策不变之后,日元兑美元大幅上涨,美元指数显著回落,欧元和日元分别走强对于中欧和中日贸易来说,也是中国贸易的有利条件。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中美经济良性循环之际,中国贸易还存在对欧和对日的潜在增长空间,中国经济回稳向好是确定无疑的。逻辑链条继续延伸,则是中国对于全球大宗商品的心理刺激,当然中国结构调整很难再现大宗商品疯狂,这正是中国经济回升的L型道路。

中国虽然能够通过结构调整控制对全球大宗商品的刺激,但是对于原油却不是这样,中国势必要在增加战略石油储备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哪怕是原油价格回升过快,这一巨无霸式的增长点,也足以撬动世界经济的心理面,从这一点来看,人民币也很难深度贬值。

中国经济拐点来临必然带动全球经济拐点来临的观点,似乎还与事实有一定距离,但是拐点来临之际,在经济数据上还存在一个延时,这足够为在市场上看空做空提供条件,于是空风日盛。仔细分析各种数据与基本面,看空做空根本站不住脚,而且往往是纰漏百出。在经济拐点来临前后,实体经济从金融市场抽血补充实力,是一个惯常现象,其往往造成金融市场先暴跌后反弹,美股2016年以来就是这样,只有拐点论渗透至人们的心理层面,才会遏制住市场的惊惧恐慌,才会真正迎来金融市场的拐点。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说美股会到10万点,显然明智的美国人对经济增长也充满了信心,哪怕这种增长要借助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焦点评论

人社部:取消没有法律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

盖章为何有奇葩?大小权力样样抓。
行政之手闲不住,必多门槛与篱笆。
为民服务要便民,公仆岂能吃拿卡。
简政放权是根本,要让市场多说话。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银行员工持股要遵循增量分享和长期导向

华挺

随着浙商银行3月底在香港完成IPO,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余恒丰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3家还未上市融资。作为上述3家中体量最大、由烟台市国资委作为大股东的恒丰银行,日前却因IPO准备工作的员工持股计划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以董事长蔡国华为代表的高管团队,因持股超过千万股、低于净资产价格认购股份而惹出争议。

让员工持有股票,让劳动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成为公司股东,并通过IPO让他们分享到企业资产资本化和证券化带来的发展成果,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充分释放经济活力,实现公平的企业价值分配机制,从而对企业中长期发展起到稳定作用。但是,员工持股计划非常复杂,制度设计如果不科学、不公平,就很容易出现和导致短期套利行为,企业高管绝对控股,垄断控股,导致高管和职工收入分配差距无限拉大。要避免员工持股走错走偏,就需要遵循激励相容、增量分享、长期导向这三方面的原则。

员工持股制度若在股票价格、持有比例、行权时间、退出机制等方面设计得当,便会产生"激励相容"的效果,即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发展捆绑在一起,员工要想获得更高的收益,则必须努力付出,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做贡献。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第(三)条第2款规定,"对购股价格低于当时净资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补缴,计入资本公积"。恒丰银行的员工持股每股认购价格为3元,而2014年底公司股本每股净资产为4.47元,差价高达30%以上。按照规定对这个差额部分应该补缴计入资本公积,但其计划中却并未安排补缴,这就无法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

过去20多年来,在员工持股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多起典型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件,员工持股之所以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是因为在认购股份过程中,没有以利润增长为基础,而是以资本存量为考量而实施,就会形成一种"瓜分蛋糕"式短视效应。上述《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公开发行新股后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单一职工持股数量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或50万股(按孰低原则确定),否则不予核准公开发行新股"。但如果董事长蔡国华的认购额确是媒体报道中的2000万股,那就远远超出50万股的限额,违背了增量资产的共享原则。

国外的员工持股通常规定员工在认购了企业的股份之后若干年内不允许流通和转让。员工持股计划还常常与退休金和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为员工增加收益,解除员工退休后的后顾之忧,起到激励员工长期为企业尽心尽力工作的作用。如果员工持股的计划不与员工的持续稳定工作结合,就难以体现一种长期的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短期的急功近利意识,这样做无疑会让员工持股走入误区,并且产生很多后续的不良效应。

未来的国企职工持股果真要体现公平合理的价值分配,就一定要提倡多元化持股结构,避免单一化和垄断化的少数持股,最好的国企资本股份证券化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内部人持股三分天下,其中民营资本和内部人持股处于相对控股地位,降低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三方持股相互钳制,相互制约,有机提携,如此,员工认购股份和持股才能健康发展。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